



论科尔政府务实的德国政策

——以十亿马克贷款为例

王 超

摘 要: 20 世纪 80 年代初,联盟党科尔政府上台执政后审时度势,采取了务实的德国政策。面对当时日益严峻的欧洲中导危机,科尔政府一方面坚决支持美国在联邦德国部署新型中程导弹,另一方面针对民主德国的借贷危机,通过向其提供十亿马克的担保贷款,来向苏东国家发出缓和信号。该笔贷款作为科尔政府务实德国政策的有力践行,在促进两德关系进一步发展,缓和欧洲紧张局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也标志着联盟党在其传统德国政策上发生重大转变。

关键词: 欧洲中导危机; 科尔政府; 德国政策; 十亿马克贷款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德国重新统一,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无论是其戏剧性的历史结果,还是其丰富的历史内涵,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有关科尔时期德国政策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科尔政府在历史关键时刻的政治作为,缺乏对其执政初期德国政策的具体实践进行考察。本文拟通过分析科尔执政初期向民主德国提供十亿马克担保贷款的背景、动因及其影响,进而揭示联盟党重新上台后对其传统德国政策的修正与发展。

一、欧洲中导危机与科尔政府的德国政策

1982 年 10 月,联盟党在时隔 13 年之后再次上台执政。不过,与 30 多年前的首次执政相比,它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由于苏联凭借其急剧膨胀的军事力量迅速向外扩张,入侵阿富汗,导致美苏关系急剧恶化。面对苏联的“严重挑战”,美国开始对苏联推行强硬政策,以遏制苏联全球性进攻的势头。双方军备竞赛也由此再度升级,进而重新进入激烈的对抗时期。美苏在其战略重点地区——欧洲的争夺与较量体现得尤为凸显,由此引发了欧洲中程导弹危机。

1977 年之前,美国在其西欧盟国部署了大量中程导弹,其力量与苏联相较占有一定的优势。此后,苏联开始在本国和东欧盟国部署能够打到西欧任何一个角落的 SS-20 新型中程导弹,以抗衡美国在欧洲的核战略武器优势。面对这一变化,美国及其西欧盟国深感不安。1979 年底,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法国和冰岛除外)在布鲁塞尔举行联合会议,一致通过了“双重决议”政策,从 1983 年开始,在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部署 572 枚美国潘兴 II 式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与此同时,美国承诺将就限制欧洲中程核武器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①。随后,美苏就限制欧洲中程核武器问

^①Reinhard Betzuege (Hrsg.). *Auß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okumente von 1949 bis 1994*. Kö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95, p. 469.

题进行了多次谈判,但由于双方基本立场相距甚远,谈判因此长期陷入僵持状态。1983年,美苏中程导弹谈判最终破裂,美国开始在联邦德国部署新式中程导弹。苏联随即宣布将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以对抗美国的行动。美苏关系旋即进入到了“第二次冷战”的严冬。

伴随着东西方关系的再度紧张,两德关系也逐渐滑入低谷。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民主德国开始限制联邦德国公民的访问数量。自1980年10月起,民主德国还大幅提高了最低兑换额。联邦德国来访者以前每天必须按1联邦德国马克兑换1民主德国马克的比率,在东柏林兑换6.5马克,在民主德国其他地方兑换13马克,而现在统一上调为25马克。联邦德国退休人员和青少年不再免除最低兑换额义务,14岁以下的儿童每天要求兑换7.5马克。民主德国的这一政策调整无疑增加了联邦德国来访者的经济负担。因而,在其实施后的两个月间,联邦德国公民到民主德国旅行的人数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4%,西柏林公民到民主德国旅行人数更是同比下降了60%^①。

此外,作为苏联的重要盟友,民主德国在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上明确表示支持苏联的立场。1982年11月,在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会议中,民主德国政府严厉谴责了美国及其盟国扩张军备的行为,声称这严重危及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以及欧洲的和平进程。对于联邦德国新上任的联盟党政府在贯彻部署美国导弹决定上所表现出的坚定立场,民主德国表示强烈不满,甚至在其机关报刊上公开指责科尔政府代表了联邦德国的反动势力^②。两德政治关系开始随之迅速降温。因此,在科尔刚上任的时候有人对两德关系的未来进行了预测,说这是缓和的终结,甚至说这是新的“冰冻期的开始”^③。

由此可见,东西方关系的“大气候”仍然影响并制约着两德关系的“小气候”。随着美苏间对抗的再度升级,两德关系的脆弱性也日益凸显。由于联邦德国身处冷战对抗的最前沿,出于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尽快改善和缓和当前的外部危机成为摆在联邦政府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在这次危机中,该以怎样的方式来践行德国政策和东方政策,这对联盟党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提出了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场欧洲导弹危机是检验联盟党能否彻底从其传统教条式德国政策与东方政策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试金石。从联盟党随后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应对和改善危机来看,重新上台的联盟党显然对此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对于联邦德国来说,安全和缓和政策始终在其外交政策中居优先地位。安全政策主要是指大西洋联盟政策。在这个联盟中联邦德国同美国共同承担着这项现实的义务。缓和主要就欧洲联合而言,或者说是承担克服欧洲分裂的责任。历届联邦德国都在努力保持着两项政策的一致性。为此,科尔在其当选联邦总理之后,就着重指出:“联邦德国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基础是北约及与美国的伙伴关系”^④。次年5月,他在联邦议会的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说:“为了克服德国的分裂,我们必须依靠北约和欧共体的支持,他们保障了我们的安全和自由,同时也支持统一的愿望——不仅是德国,而且也是欧洲本身。”^⑤

面对美苏间愈演愈烈的中程导弹危机,刚刚上任的科尔政府积极支持美国在联邦德国部署新型中程导弹。这与前社民党施密特政府在此问题上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形成鲜明的对比。之前一度冷淡的德美关系也因此重归于好。德美关系的改善,特别是双方在军事与安全的合作与交流的扩大,不仅加强了联邦德国的国家安全防务能力,而且还增加了美国对联邦德国的信任度,这对争取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支持和认可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然而,在重视加强德美关系和西方联盟的同时,科尔政府并没有抛弃社民党所开创的具有缓和特征

①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Die Entwicklung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980—1986; Eine Dokumentation*. Bonn, 1986, p. 8.

② 4. Tagung des Zentralkomitees der SED. In: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2, p. 871.

③ Kai Diekmann, Ralf Georg Reuth, Helmut Kohl. *Helmut Kohl: Ich wollte Deutschlands Einheit*, 2. Aufl. Berlin: Ullstein, 1999, p. 29.

④ *Aus der Regierungserklärung von Bundeskanzler Kohl*. In: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2, p. 1216.

⑤ *Bundeskanzler Kohl zur Deutschland- und Ostpolitik*. In: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3, p. 665.

的德国政策。科尔在政府声明中强调：“联邦德国会继续履行现行条约，保持与民主德国的合作关系^①。次年5月，他又在政府声明中明确表示：“联邦德国的德国政策始终基于：《基本法》、《德国协定》……《基础条约》……”^②就科尔政府德国政策的具体特点而言，也首先体现在对社民党“缓和政策”的继承性上面，具体表现为：进一步加强同民主德国在经济、文化、人员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克服战后德国日益固化的分裂状态。

作为基民盟主席的科尔，其德国政策当然也同时体现了联盟党的传统特点，即毫不动摇的维护《基本法》中有关重新统一的条款。为此，科尔为政府制定的目标是：“致力于在欧洲和平的框架中，实现一种德国人民可以通过自由的自决，重新获得德国的统一。”^③在他看来，保障欧洲的和平是德国统一的基本前提和必经道路；此外，德国问题仍然保持着公开性，它是由欧洲的分裂造成的，其只有在欧洲的框架中才有解决的可能。

科尔政府深知，务实的德国政策不能只停留在口号和理论当中，它只有作为一种对话、协调、合作的政策才能成功。为此，他强调说：“正如目前的这种状况，我们不想简单行事。我们想通过具体的步骤，缓和这种分裂，首先在危险性较低的领域……德国政策必须要以我们这个时代现实的力量对比为出发点……事实上，这种力量不仅包括政府政策和军事实力，而且还包括德意志民族关于统一的意愿。保持德国问题的公开性不仅仅依靠法律状况，而且还有我们人民意愿的历史力量。那些与此相悖的言论，无论是我们的西方盟友还是东方的邻国都不会相信。”^④

因此，同社民党一样，联盟党不仅将德国统一作为一个长远目标，而且更多地将德国统一同欧洲缓和进程结合在了一起。积极改善和密切两德关系，推动欧洲和平进程进一步发展成为该届政府德国政策与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即为日后德国的重新统一创造良好的内、外部条件，尽快缓和当前的欧洲导弹危机便成为科尔政府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民主德国外债危机与十亿马克贷款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世界政治局势日益严峻的同时，世界经济也危机四伏。在这一时期，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在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一再飙升，推动了各国的物价进一步上涨，从而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其中，波兰和民主德国面临的经济危机尤为严重。与此同时，苏东国家的西方债务也在不断地高涨。截止到1980年底，经互会国家的西方债务总额大约为700到750亿美元^⑤。

在同西方国家进行的对外贸易中，民主德国同样出现了大量贸易赤字。20世纪80年代初，受世界经济危机和自身经济结构问题的影响，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并且面临着巨大的外债压力。1982年底，民主德国对西方国家的负债总额大约在90亿到130亿美元之间，在整个经互会国家中居第三位，仅次于波兰和苏联^⑥。此外，民主德国的债务结构也存在问题，因为40%的债务需要在一年内偿还，而上一年的利息非常高，民主德国短期借贷需求因而急剧增长。如果无法获得新贷款的话，民主德国将无法履行偿还义务^⑦。民主德国外贸部长戈洛德科夫斯基对民主德国当时的处境做了如下的回顾：“民主德国对西方工业国家的债务净额大大增加，由于美国紧缩的货币政策，由此产生的利息也飞速增长。我们

^① Bundeskanzler Dr. Kohl: Regierungserklärung vor dem Deutschen Bundestag, I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II/Bd. 1, Bonn: Deutscher Bundes-Verlag, 1985, p. 10.

^② Klaus Stüwe (Hrsg.), *Die großen Regierungserklärungen: Der deutschen Bundeskanzler von Adenauer bis Schröder*, Leske und Budrich, Opladen, 2002, p. 309.

^③ *Aus der Regierungserklärung von Bundeskanzler Kohl*, In: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2, p. 1217.

^④ Helmut Kohl, *Erinnerungen 1982-1990*, München: Droemer, 2005, p. 173.

^⑤ *Antwort der Bundesregierung auf die Kleine Anfrage der Fraktion der CDU/CSU "Zahlungen an die DDR"*, I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I/Bd. 8, p. 300.

^⑥ Seiffert Wolfgang, *Zur Verschuldung der DDR und ihren Konsequenzen*, In: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2, pp. 1241~1243.

^⑦ Helmut Kohl, *Erinnerungen 1982-1990*, München: Droemer, 2005, p. 173.

几乎需要将全部出口收入,约有5至6亿马克用于支付贷款的本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①

民主德国负债累累,无法从西方国家获取新贷款以缓解信贷危机,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同样深陷经济困境,无力向其提供援手。对于民主德国而言,如果无法及时偿付西方债务的话,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商业声誉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民主德国的经济困境会进一步恶化。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塔格回忆道:“80年代初发生的事情真是生死攸关。可供民主德国使用的高效资源日益减少,石油供应停滞不前,与之前相比较,生产相同数量产品需要加倍的付出……那个时候,每天都会发布关于支付状况的最新动态报告……只剩下与联邦德国保持紧密联系这条出路了。”^②

由此可见,80年代初,民主德国解决自身外债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鉴于两德长期保持着特殊的经济关系,且联邦德国又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施以援手,所以,对民主德国而言,在其借贷四处碰壁的情况下,通过向联邦德国申请贷款,不失为一种解决自身外债危机的可靠出路。即使是在昔日强硬的对手——联邦德国联盟党重新上台之后,民主德国仍然向其间接表达出借贷的愿望,而民主德国的借贷需求恰好也为联邦德国科尔政府提供了一个借以改善两德关系的机会。

1982年秋,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通过朋友梅尔茨获悉了民主德国的贷款愿望。后者是一名从事鲜肉贸易的商人,同民主德国有过多年的贸易往来。随后,施特劳斯就此事致函联邦总理科尔,询问他是否对此感兴趣,科尔在回复中明确表示赞同^③。同年12月,科尔同施特劳斯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会谈中两人达成共识:鉴于目前民主德国严重恶化的经济状况……摆在联邦政府面前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有可能通过金融援助来进一步打开探亲访问的这扇大门。这是联邦政府应该做的一切,藉此更多的民主德国公民能够访问联邦德国^④。此外,科尔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联邦德国不施以援手的话,民主德国只会更加向苏东阵营靠拢^⑤。谈话结束后,科尔立刻委托施特劳斯负责处理向民主德国提供贷款的事宜,联邦总理府国务秘书延宁格给予协助。

于是,施特劳斯通过梅尔茨这一中间人的帮助,迅速同民主德国外贸部长沙尔克建立了私人的联系。之后,双方就贷款事宜进行了三轮秘密谈判。会谈期间,施特劳斯和延宁格多次阐明联邦政府的基本立场,即联邦政府的经济援助必须同民主德国的人道主义援助结合起来,并且要求民主德国尽快改善边境检查状况以及两德人员之间的相互交往活动。由于联邦政府计划提供是私人银行贷款,因此需要担保。民主德国方面建议:民主德国愿意将5年的柏林总支付^⑥作抵押——根据当时的情况和计划中将增加的额度,约有30亿马克。如若民主德国偿付本息发生困难,联邦政府可以从柏林总支付中扣除相应的数额,付给银行^⑦。

1983年7月,施特劳斯与昂纳克进行了第三次密谈,双方最终就贷款细节及模式达成共识。会谈结束后,双方共同签订了一笔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十亿马克贷款协议。民主德国确认了之前商定的信贷模式,即通过债权转让来获得担保贷款。就在十亿马克贷款协议刚刚签订不久,民主德国就立刻通告了苏联^⑧。苏联方面尽管对两德间的信贷业务颇有顾虑,却没有横加阻挠。显然,在苏联看来,鉴于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普遍面临的经济困境以及波兰危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维护民主德国的支付能力和稳定要比借机向两德关系施压来报复导弹安装更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笔贷款没有附带书面的政治要求,但联邦政府对民主德国仍抱有一些政治上的期待。这些在双方进行的借贷谈判中早已言明。例如,尽可能地扩大民主德国公民旅行的机会,降低对联邦德国访问者实行的最低兑换额,放松民主德国公民到联邦德国进行紧急家庭团聚以及降低定期

① Alexander Siegfried Schalek-Golodkowski, *Deutsch-deutsche Erinnerungen*. Hamburg: Rowohlt, 2000, p. 285.

② Günter Mittag, *Um jeden Preis; im Spannungsfeld zweier Systeme*. Berlin: Aufbau-Verl, 1991, p. 82.

③ *Die Vorgeschichte des Milliardenkredits; Erklärung von Franz Josef Strauß*, In: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3, pp. 889~891.

④ Kai Diekmann, Ralf Georg Reuth, Helmut Kohl, *Helmut Kohl; Ich wollte Deutschlands Einheit*, 2. Aufl., p. 30.

⑤ Helmut Kohl, *Erinnerungen 1982-1990*. München: Droemer, 2005, p. 174.

⑥ 即两德统一之前,联邦德国每年向民主德国支付的一笔通往西柏林的过境费用。

⑦ Franz Josef Strauß, *Die Erinnerungen*. Berlin: Siedler, 1989, p. 474.

⑧ Günter Mittag, *Um jeden Preis; im Spannungsfeld zweier Systeme*. Berlin: Aufbau-Verl, 1991, p. 85.

旅行许可的年龄限制等方面^①，而民主德国在接受贷款之后，也的确在相应的领域做出了妥协。例如，免除了联邦德国 14 周岁以下青少年的最低兑换义务；降低了联邦德国退休人员的最低兑换额，由 25 马克降为 15 马克；将来访者的停留时限从原来的每年 30 天延长为每年 45 天；民主德国还拆除了部分安装在两德边境的自动射击装置等^②。

基于民主德国作出的上述让步，联邦政府接受了来自民主德国新的贷款申请。1984 年 7 月，双方又签订了一笔 9.5 亿马克的贷款协议。随后，民主德国做出了进一步的回报：建立在两德边界的自动射击装置被完全拆除^③。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对两德旅行交通方面的限制也有所松动。根据联邦德国的统计资料显示，1983 年，来自民主德国紧急家庭团聚的人数为 64 052 人，比 1982 年增长了 40%。由联邦德国到民主德国或经过民主德国去第三国旅行的人数大约为 302 万人，同比 1982 年增长了 4.6%^④。到了 1984 年，除来自民主德国紧急家庭团聚的人数外，两德间其他方面的旅行、访问人数都比上一年有所增加^⑤。而 1985 年，两德间旅行交通以及人员访问方面更是得到了全面的改善，来自民主德国紧急家庭团聚的数量也有所增加。与此同时，进出西柏林的过境交通也显著增多^⑥。

三、十亿马克贷款的意义及影响

（一）两德关系的“振奋剂”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欧洲导弹危机，致使两德关系一度降到 1972 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然而，新上任的联邦政府并没有因此放弃改善两德紧张关系的努力。1983 年，科尔政府向深陷外债危机的民主德国提供了十亿马克的担保贷款，充分表明了联邦德国的合作诚意。1984 年 3 月，联邦总理科尔在《分裂的德意志之民族状况报告》中，对十亿马克贷款做了如下的评价：“随着联邦德国信贷机构为民主德国提供的十亿马克贷款获得批准，联邦政府在去年夏天向民主德国领导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一决定对民主德国公民来说也是一个象征……我们准备为了人民的利益，在两德关系的框架中进行理性的合作。”^⑦

由此可见，科尔政府意图通过金融上的援助为两德关系创造缓和的政治氛围，以此为两德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做进一步的铺垫。总理府国务秘书延宁格作为联邦政府该项政策的倡导者及十亿马克贷款谈判的主要代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曾明确表示，该笔信贷业务将推动两德关系朝更广泛领域发展，并由此引发了一个进程，即它被看作为联邦德国同民主德国关系的“振奋剂”^⑧。

对于民主德国而言，联邦德国提供的这笔贷款在经济方面的意义更为重要。在接受由联邦政府担保的首笔十亿马克贷款后不久，民主德国便表现出想将借贷业务进一步延续的愿望。随着民主德国作出相应的妥协，第二笔贷款业务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两笔贷款不仅为急需偿还外债的民主德国解了燃眉之急，而且还有助于恢复民主德国在国际信贷体系中的声誉。特别是两德间贷款业务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示范效应，使得其他西方国家重新向民主德国敞开了贷款的大门。

尽管两德参与信贷谈判的动机各不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十亿马克贷款在缓和两德关系以及推动两德间进一步谈判方面，确实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民主德国也开始更多地表现出愿意继续保持缓和与合

① *Die Erklärung vom Staatsminister beim Bundeskanzler vor der Presse am 25. Juli*, i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II/Bd. 2, Bonn: Deutscher Bundesverlag, 1985, p. 292.

② *Staatsminister Dr. Jeminger: Erklärung zur Entwicklung der innerdeutschen Beziehungen*, i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II/Bd. 2, Bonn: Deutscher Bundesverlag, 1985, pp. 294~295.

③ *Archiv der Gegenwart* vom 30. November 1984, p. 28295.

④ *Reiseverkehr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DDR im Jahre 1983*. In: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4, p. 557.

⑤ *Innerdeutscher Reiseverkehr 1984 gestiegen*. In: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5, pp. 1019~1020.

⑥ *Innerdeutscher Reiseverkehr hat 1985 zugenommen*. In: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6, p. 331.

⑦ *Bundeskanzler Dr. Kohl: Bericht zur Lage der Nation*. I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II/Bd. 2, p. 80.

⑧ *Staatsminister Dr. Jeminger: Erklärung zur Entwicklung der innerdeutschen Beziehungen*. I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II/Bd. 2, p. 293.

作的态度。例如,民主德国在接受贷款之后,逐步放松了对两德间旅行交通以及人员交往的诸多限制,两德间旅行交通以及人员往来得以再次出现高潮。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看到,之前两德间的紧张关系已渐趋缓和。该报告称:“中央政治局已广泛处理进一步发展两德关系的相关问题。毫无疑问,目前解决主要问题的方法在于确保和平与人民间的合作,其必要性不言而喻。两德关系同样在新的局面下,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并逐步地恢复正常。”^①

另外,1982到1983年苏联最高领导人接连去世,民主德国想抓住这样机遇,来扩大其对外的活动空间。正是在这笔贷款的推动下,两德随后在环境保护、科技交流、邮电通讯、交通运输等领域迅速开启了一系列的谈判与合作。两德关系也由此走出了欧洲导弹危机的阴影,并进入到新的合作发展时期。

(二)“小气候”带动“大气候”

联邦德国同民主德国达成的贷款协议对当时欧洲局势的意义在于,减小了东西方的冲突,特别是来自苏联的报复行动对两德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联邦德国外交部长根舍在谈到联邦政府参与这项贷款业务的动机时,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是针对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措施,但透过他的讲话内容,我们也可以从侧面窥得一二。根舍讲道:“作为责任共同体的两个德国有责任维护中欧的稳定,这就要求其自身首先是稳定的。健康的经济是稳定的重要基石,而贷款则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由此产生的政治利益同样有利于欧洲的缓和。”^②1983年7月,就在两德十亿马克贷款协定签订后不久,科尔总理和根舍部长一同出访了苏联。在同苏联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会谈期间,科尔以十亿马克贷款作为证明,尽管联邦德国决定部署美国的新型导弹,但并没有表现出好战的意图^③。随后,联邦德国德国内部关系部部长温德伦在华盛顿关于德国问题的讲话中也谈到,尤其是在反对军备竞赛的高潮时期接受信贷,民主德国也同样承认,在11月份过后,世界没有走向末日,从这也得到了证实^④。

显然,科尔政府试图通过密切两德经济关系,以两德政治的小气候来带动东西方的大气候,尽可能地改善东西方关系,从而促进欧洲紧张局势走向缓和。而在另一方,民主德国不仅追求经济上的利益,而且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也旨在缓解紧张局势,并且寻求联盟间的对话途径。1984年和1985年,科尔利用参加苏联领导人葬礼的机会,与昂纳克进行了会晤,最终达成了“我们的国家是分裂的,但德意志民族继续存在”,有责任“竭尽全力不再在德意志领土上发生战争”的共识^⑤。两德也由此公开向欧洲其他国家传递出缓和信号,而这些只有在相互信任和相互妥协的氛围下才有可能实现。于是,在欧洲便出现了这样一幅有趣的图景。虽然美、苏欧洲中程导弹的谈判破裂,再次掀起冷战小高潮,但两德间却营造出缓和的口号和氛围,如“永远不再在德国土地上发动战争”、“德德责任共同体”、“德德安全共同体”。在欧洲导弹危机的阴影下,双方强调不再是敌人,而是命运与共的伙伴、休戚相关的兄弟。由于两德身处东西方冷战的前沿阵地,两德关系的缓和不仅能够展现出良好示范效应,同时也能以实际行动为东西方关系的再次缓和打上一剂“强心针”。

除此之外,这笔贷款协定的达成也表现出,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领域存在利益交集。我们还应看到,在这一历史时期,随着两德自身实力(尤其体现在经济方面)的不断增强,他们在各自阵营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两德关系问题上,双方也逐步开始寻求摆脱大国的束缚,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立性。特别是,随着联邦德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在盟国内和国际上地位的不断上升,使其在协调盟国利益的同时,开始更为主动地追求民族自身的利益。这与其于战后五六十年代执政期间,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表现为完全依赖西方盟国的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在科尔政府的不懈努力下,开创了以“小气候”带动“大气候”的范例。

^①Zur 6. Tagung des Zentralkomitees der SED. In: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3, p. 896.

^②*Archiv der Gegenwart* vom 14. August 1984, p. 27966.

^③Timothy Garton Ash. *Im Namen Europas: Deutschland und der geteilte Kontinent*. München: Hanser, 1993, p. 154.

^④Bundesminister Windelen; *Die Deutsche Frage*. I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II/Bd. 2, p. 39.

^⑤*Gemeinsame Erklärung zum Gespräch zwischen Helmut Kohl und Erich Honecker in Moskau*. In: *Deutschland-Archiv; 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r Deutschlandpolitik*. Köl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5, p. 446.

（三）联盟党对其传统德国政策的修正与发展

五六十年代联盟党首次执政时期，由于深受美苏冷战以及阿登纳实力政策的影响，联邦德国长期采取“以对抗求统一”的强硬政策。自60年代中期，随着“柏林墙”的建立以及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联盟党政府虽被迫对该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但仍未彻底摆脱具有浓厚对抗色彩的冷战思维。因此，在70年代联盟党作为反对党经常抨击社民党“以接近求转变”的缓和政策。

然而，当联盟党于80年代初再次执政后，对民主德国态度及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为此，社民党议员在联邦议院公开提出了这样的诘问：“联盟党之前作为反对党的时候，经常在联邦议会以“以金钱换希望”来形容社民党的德国政策。如今，联盟党已经尝试通过为民主德国提供近二十亿马克的担保贷款，来使其德国政策进一步运转。”^①显然，联盟党重新执政后，不再按照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思维去解决德国问题了。与此同时，科尔政府开始通过经济手段来促使两德共同合作，相互接近。而这种变化一方面折射出，联盟党深刻反思了其早期教条的德国政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联盟党虚心借鉴了社民党执政时期务实的德国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从十亿贷款的谈判模式可以看出，联盟党政府在德国政策上表现得更加灵活和理性，它已经彻底放弃了先前所坚持的以对抗求统一的政策。在联盟党重新执政后，开始尝试通过共同的对话规则，尽可能的淡化信贷业务同政治回报间的关系，最终以一种非书面的形式来完成。可见，联盟党的德国政策已不拘泥于社民党时期的“以付出换回报”模式，开始采用“以信任换信任”的模式。

联盟党科尔政府以理智、务实的态度给两德关系带来暖意，尽管东西方的关系再度紧张，联邦政府还是极力地在为其德国政策创造有利的内、外部条件。正如德国内部关系部部长温德伦在关于两德关系的现状及其前景的谈话中说：“对我们而言，实现缓和以及改善关系，往往只能用小的，甚至是更小步骤来进行……即使是很小的进步也能促进缓和。我们决不能满足于理论概念，人们从中什么都无法获得。”^②从温德伦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联盟党已经充分借鉴和吸收了社民党“以接近求转变”政策以及“小步子”政策之精髓，即通过两德间的相互接触、对话与交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从一些容易办到的、具体的事情做起，不断推进欧洲缓和进程，以此逐步打开双方僵持和敌对的状态，然后通过积无数个“小步子”为“大步子”，为两德在自由与和平中实现民族的自决铺平道路。

四、结 语

综上所述，联盟党于20世纪80年代初再次执政后，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继承并发展了社民党具有缓和和务实风格的德国政策。具体表现为，科尔政府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应对愈演愈烈的欧洲中导危机。尤其是，联邦政府开始注重利用“经济杠杆”来对民主德国施加影响。1983年，科尔政府为了减少因部署美国新型中程导弹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针对民主德国严重的外债危机以及迫切的借贷需求，通过为其提供十亿马克的担保贷款，来向苏东国家发出缓和和信号。该笔贷款作为科尔政府务实德国政策的一次有力践行，不仅改善了两德间的僵化关系，促使民主德国进一步放松了对两德之间旅行交通、人员往来的控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紧张的欧洲局势。可见，联盟党已经从其传统教条式德国政策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开始主动实践“以接近求转变”的迂回战略，为日后的德国统一不断积聚内、外部的有利条件。

-
- 作者简介：王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北京100006。Email: david81413@163.com。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770015)
 - 责任编辑：桂莉

^① Hans Büchler, Rede vor dem Deutschen Bundestag. I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II/Bd. 3. Bonn: Deutscher Bundes-Verlag, 1985, p. 118.

^② Bundesminister Windelen, Stand der innerdeutschen Beziehungen und ihre Perspektiven. I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Hrsg.), *Tex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Reihe III/Bd. 2, p. 390.